

# 洁白的百合花献给父亲陈世骧

陈受宜 陈受钧



陈世骧  
(1905~1988)

昆虫学家。1905年11月5日生于浙江嘉兴。192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1934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8年1月25日在北京病逝。历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及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学研究室研究员兼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国动物志昆虫纲鞘翅目铁甲科》获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了,可是十七年前刻骨铭心的那一刻,对我们而言都像发生在昨天。

1988年初的那个周末,为了协调《动物志》的研究,父亲整整2天都在忙着找当事人谈话,在此之前他已经感冒好多天了,我们曾劝他去医院,可他总放心不下《动物志》的编写,说协调好了就去。那天早晨他还在担心:“协调的双方虽已口头答应,会不会执行呢,……”。八点四十分,接他去医院的车来了,他说,不是九点多才走吗?是的,九点十分,父亲去了,就在去医院的路上。父亲走得匆忙,走得猝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但是他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刚正不阿的人格、严谨治学的精神永远留在了人间!

在我们的心目中,父亲是慈祥、可亲的,从来不曾责骂过我们,总是在言传身教中,告诉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1951年,父亲执行国家任务去



---

○ 上图  
陈世骧、谢蕴贞夫妇 1957 年全家福

○ 中图  
1933 年陈世骧和谢蕴贞夫妇摄于法国巴黎

○ 下图  
八十年代的陈世骧先生

---



了朝鲜前方,妈妈和我们都非常担心。后来爸爸告诉我们,他们每到一地都住在志愿军军营。一次,他们刚转移,美军就炸毁了那个营房,另一次,在山路上,前面的军车翻到山沟里。我们问他怕不怕,他说:“怎么不怕,可是国家需要,怕也一定要去啊!”50年代初,他到北京就任中科院昆虫所所长。他邀请了钦敬德、马世俊、龚坤元、熊尧等先生到所里主持开展生态、生化和毒理等方面工作,大大提高了全所的学术水平。图书馆订书籍、杂志,学会办学报,父亲也总要亲自过问,他说人才和信息是办所的根本,有了一流的人才,才有一流的工作,信息不通,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怎么赶超国际水平呢!60年代初,妈妈自参加工作以来就没有提过级,觉得无论如何应该轮到她了,可是父亲却对她说,你这次不能提,僧多粥少,名额有限,我先提升了自己的老婆,如何服人?就这样,直到“文革”后退休,在法国留学多年的妈妈还是六级副研究员。父亲对我们说,我也觉得亏待了你妈,但是当了所长就要为全所考虑,自己的事,就不能多想,这样才能使人信服,才能办好所。

“文革”后期,中科院组织了编写生物史小组,在讨论到遗传规律时,有人竟认为不存在基因并反对将相关研究结果写入书中,为此,争论得非常激烈。妈妈劝爸爸不要与原本关系不错的同行伤了和气,再者,恩格斯说过生命是蛋白体存在的形式,在那个年代,搞不好就会被扣上反恩格斯的帽子,甚至上升到反马列,反革命。但是父亲却坚持着,他说,如果不将真实的科学介绍给大众,就是犯罪!果然,有人向领导反映了“陈世襄的反恩格斯言论”,幸亏秦力生同志已经主持工作,结果以学术争论中的不同观点了结了此事。

父亲是一个敦厚的长者,对年轻人关爱备至,时常有人上门或来信请教问题和请他修改论文,他总是认认真真地回答和修改。有时改得很多,甚至修正观点,作者真诚地希望在论文上加上父亲的名字,但是父亲坚决拒绝。他说,给后辈改稿子提点看法是应该的,培养人才不一定非是自己的学生。通过改论文,能提高他们的水平,也是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父亲顶顶反对只改了几个字、甚至只看了一遍就把自己的名字加上的行为,他认为这是变相剥削。前年,一个相识多年的年轻院士朋友在偶然间知道我的父亲是陈

世骧,他对我说,当年他还是复旦大学学生时曾给父亲写过信,父亲认真地回了信与他讨论问题,使他很感动。在参加学术活动的时候,常有人对我们说在教科书上读到父亲的工作,在讲课中提到父亲的观点,每次,我们都有一份深深的感动,虽然他老人家不在了,他的思想永在。

父亲所从事的专业是个传统专业,有人认为系统分类学太老了,没有什么价值,父亲却很不以为然。他常说,“系统分类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系统分类学与物种的进化密切相关,物种进化中更有许多未知环节。没有落后的专业,只有落后的技术,传统专业要用新技术来充实,解决以往不可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怎能说没用?”父亲一直希望能与我们在系统分类学及物种演化中运用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数学(现在已发展为生物信息学)方法中合作,可惜因为我们都忙于完成自己的课题而未能如他老人家的愿,成为永远的遗憾。

父亲非常重视学习生命科学新知识,了解新进展。图书馆是他最爱去的地方,在他每次生病住院的时候都要我们到图书馆帮他借新期刊。父亲五十多岁时自学了高级生化,“文革”后学了分子生物学,虽然他的研究不见得用得上这些知识,但是他说,一个生物学家必须掌握生物学的基本知识,了解生物科学的重大进展,才能开阔思路,想得更远。

父亲极其谦和、朴实,厌恶虚荣和奢华,生活很简朴,为数不多的几套西服只在参加国宴、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才穿。我在中关村上班时,时值冬日,有位同事对我说,“上下班常见一老头,头带一顶怪怪的黑毛线帽,身穿中式棉袄,外加一件皮背心,人家说是个学部委员,原来是你爸”。父亲就是如此,凡生活事,简单、实用便好。

父亲酷爱足球,也爱打网球和下围棋。在上海的时候常带我们一帮小孩在岳阳路320号大楼后的草地上踢皮球,与冯德培伯伯打网球时,常许我们以糖果,让我们帮着捡球。到北京后,主要以摆围棋谱为乐,也常和我们一道唱歌,除了几首法文歌外,最爱唱的是“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唱起来很投入,往往一连唱两遍。父亲虽然是生物学家,可文学底子不薄,喜爱古典文学,最爱读《古文观止》,读起来朗朗有声,摇摆着身子,沉浸在太史公

的意境中。

我们没有为父母立碑，他们的纪念碑立在后辈、后学们的心中！

生命来自海洋，根据父母的愿望，父亲和母亲已经回归大海，回到生命来自的地方。爸爸，您的生日快到了，谨献上一束洁白的百合花，祝您老人家生日快乐，在天上！